

丘濬与他的海运主张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林冠群 图\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瑛



丘濬画像

7月18日是世界海洋日。更好地保护利用海洋,成为人类的共识。纵观中外历史,凡着眼于海运,敢于利用大海的国家和民族才是大有作为、逐渐强盛之邦。

早在中国的明朝,生长于大海之隅的明朝海南籍大臣丘濬就曾经提出善用大海的主张,他谈到,“臣家居海隅,颇知海舟之便。”并曾在《大学衍义补》一书中特辟专章对漕运问题提出独到见解。在他看来,海运比陆运可省费用百分之七八十,比河运省百分之三四十。因此他认为国家不能仅仅依靠河运,为长久之计应辅以海运。但他的这一提议,却遭到清乾隆年间的文臣纪昀的大加贬驳,他不仅一口咬定丘濬“其人不足重”,还将丘濬主张海运的主张,视为“有害无益,损伤人命”的荒谬之举。

丘濬的海运主张为何难逃“荒谬”的厄运?本期讲谭,请海南文史学者林冠群先生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,为您解读历史的真相。

丘濬与海瑞,一个以官职最高、学识渊博,一个以行事果敢、刚正不阿而名垂青史。两人死后都归葬海南,且至墓园相去不过数里,都是国家级的文物单位。然而海瑞墓风光无限而丘濬墓却冷冷清清,知者不多,游者更少。

这不由得使人想起前人对于丘濬的一些批评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清乾隆年间的纪昀(晓岚)。他在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中一口判定丘濬:“其人不足重。”意即丘濬其人立身行事不怎么样,没有什么可称道的作为。另外,还专门批评丘濬力主海运的主张。他说丘濬:“又力主举行海运,平时屡以为言。此书(指丘濬的《大学衍义补》一书)更力申其说……然一舟覆没,舟人不下百余,粮可抵以转输之费,人命以何为抵乎?其后万恭著议,谓为有大害而无微利,至以‘好事’斥之,非苛论也。”

在纪昀看来,丘濬主张海运是个“有害无益,损伤人命”的荒谬之举。纪昀在这里提到的万恭,是明嘉靖进士,官至兵部右侍郎,曾因治理黄河而有名于时,被称为“异才”之士,因此他对丘濬的批评更成为纪昀抨击丘濬最具杀伤力的炮弹。

知海舟之便 力主海运

明朝自永乐皇帝始,将国都迁移到北京。当时,自山海关以外,已经属于边关重地的辽东边防前线,从朱元璋起,每年都要从关内调拨大量粮饷支持军队的戍守;而帝都北京的生活所需也必须仰赖江淮一带供给。所谓“江淮熟,天下足”,“江淮桑柘,衣被天下”,农业技术发达,经济基础雄厚的江淮一带实为朱明王朝安邦立国的根本所在。

但物质的流动需要运输,而明代的运输与宋元等前代一样大都通过漕运实施。所谓漕运就是利用淮河、运河等陆地水系组织船只承运货物。历代封建王朝都因此设有专管河道运输的“漕臣”,明时因为经济发展比前代更为进步,因此漕运的重要性更其明显。但内河运输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受黄河泛滥及水旱灾害的影响,或河道淤塞,或河水暴涨,枯竭,造成运输不畅甚至停滞。其中尤以黄河泛滥为害最大,一有河害,漕运便大受影响,所以明王朝非常重视黄河的治理。每年都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治河,造成整个社会的沉重负担。

丘濬作为朝廷中的一员对此早有想法,所以他在《大学衍义补》一书中特辟专章对漕运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。他说:“自古漕运,所从之道有三:曰陆、曰河、曰海。”认为这三者之中,海运比陆运可省费用百分之七八十,比河运省百分之三四十。因此他认为国家不能仅仅依靠河运,为长久之计应辅以海运,他说:“臣家居海隅,颇知海舟之便。”

他在书中详细介绍了海运的方法,其中包括访问渔民、勘察海道、打造船只、挑选舵工、观测气象等等,从中可见他对此问题的真知灼见及深思熟虑。为了说服持不同看法者,他还特地翻找前代档案,从元代的历史文献中抄录出元代至元二十年(1283年)至天历二年(1329年)的三十六年间,元代实行海运时的详细数据,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说明海运比河运“所得益多”!(见《大学衍义补》卷34)

谋事在先 反被斥为“好事”

值得注意的是,丘濬提出这些建议的时候,正是黄河相对稳定,漕运得以正常行驶之日,可谓河清海晏,国家无事之时,所以后来的万恭指斥他“好事”也并非信口开河。然而,丘濬考虑的是:“今漕河通利,岁运充积,固无资于海运也。然善谋国者,恒于未事之先,而为意外

之虑。宁过虑而无使临事而悔。”他认为,不能因为眼下河运畅通便麻痹大意,应谋事在先,不要等到有事了才后悔不及。万一有一天内河漕运不通,因为国家“财赋之人,皆自东南而来。会通一河,譬则人身之咽喉也,一日食不下咽,立有死亡之祸”!可惜这“善谋国者”之言竟然得不到当时的万恭及至后世的纪昀之类保守官僚的赞同,不但不予支持还斥之为“好事”!

然而,满朝文武,有识之士还是有的。丘濬之后,明隆庆、万历、崇祯年间分别有梁梦龙、王宗沐、沈庭扬等人都主张丘濬的海运方法,并用此方法实施海运,取得了明显的良好效果。此等有识之士还特别指出,实行海运可以巩固海防,使明军习于海战,防备倭寇的入侵。如《殊域周咨录》卷二:“国初海运之行,不独便于漕纲,实令将士习于海道,以防倭寇。”《五杂俎》卷三:“海运一行,所费可省,且可使浙、直诸军因之习于海战,倭寇之来可以横流而御。自海运废,而士益惮于海矣。”

至明末清初,遗老顾炎武更是对丘濬的海运主张推崇备至,他的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卷四称海运有“十二利”。其中有一利特别值得注意,即实行海运可以杜绝沿河官员借机贪污。原来,实行内河漕运,朝廷有免除损耗的政策,允许沿途官员报送损失,于是有些不法官员谎报实情,有损失却瞒着不报;没有损失却坑害主运的船工等百姓,将人捉到牢里,勒令赔偿。种种弊端,“情态万状”:“有实漂流而以为虚,至死狱中而责偿不获;有不漂流而以为实,各分其利而亏损在官”!如此看来,万恭指斥丘濬“好事”其实是将自己的立场放到贪浊腐败的官员方面去了,他不会不知道内河漕运的这些弊端。

万恭以治理黄河而出名,他的主要手段是高筑河堤将黄河水夹在河堤内使水流湍急,冲刷泥沙,使河床不会淤浅。他的这一方法得到很多人的赞许,认为是“千古不易”之方。万恭大概也因此很自负,对丘濬的海运主张颇不以为然。然而从长远看,这种仅致力于内陆航运的观点是十分狭隘而近视的。

纵观中外历史,凡着眼于海运,敢于利用大海的国家和民族才是大有作为、逐渐强盛之邦。明朝在十四、五世纪时,本有类似郑和下西洋的向海洋挺进的壮举,可惜正是像万恭、纪昀这类封建保守官僚的颀顽无知,竟以“损伤人命”这样的理由来阻断海运的实行!其实治理、巡守黄河以及漕运军饷的过程,死人之事又何止千百?若认真比较,还远多过海运的偶然遇险。而进入十七、八世纪之后,西方的英、法、葡、西等重视海洋的国家纷纷走上海外扩张的道路,西方的三桅船乘风破浪进入南中国海,中国落后挨打的命运便形成了。再回头看万恭治理黄河的“政绩”,就在他们因“治理有方”获得皇上的奖赏后不久,至万历二年,黄河又决口,“河道淤塞,漕艘梗阻者数年”!不知他此时还有什么理由指斥丘濬的“好事”?

主张受冷落 惟愿死前还乡

丘濬的正确主张就这样被无知与狂妄冷落了。因为他的主张得不到重视,尽管他曾位极人臣,坐到了内阁首辅的位置,还是不能施行自己的正确主张,又因为年老体衰(其时他已经七十多岁,一目失明),心有余而力不足,时时向皇帝请辞让贤,却又得不到批准。最后以身殉职,死在任上。像这种情况还得不到纪昀等后世官僚的谅解,以一句“其人不足重”试图“盖棺论定”。

不过,按丘濬生前的志向,他不会计较这些。他一生稳健、平淡,淡泊明志,宁静致远,不是那种争宠恋禄,贪图富贵之人。相反,他一再表白:“人生但得平平过,不用标词更问天”,晚年即使身居相位,仍念念不忘的是早日退休,归隐海南。至有“玉殿东头第一班,朝朝屏息奉龙颜。百年已自七旬过,一日都无数刻闲。恋土每怀生处乐,乞身惟愿死前还。文渊阁下归来处,愁看残阳薄暮山”的诗句,恋土怀乡之情溢于言表。而今,他能静静地躺在故乡的土地上,我想他已经心满意足了,又何必计较那墓园的冷落!



↑坐落于海口市郊水头村的丘濬墓,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

➡位于海口府城的丘濬故居。